

论美国在缓和后世界中的

新作用

——保卫美国



论美国在缓和后世界中的 新作用

保 卫 美 国

〔美〕当代问题研究所 编
国际问题研究所齐沛合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80年·北京

The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Studies
DEFENDING AMERICA
Toward a New Role in
the Post-Détente World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 New York, 1977

论美国在缓和后世界中的新作用

保卫美国

〔美〕当代问题研究所 编
国际问题研究所齐沛合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²/16, 10³/16, 印张 211 千字
1980年1月第1版 198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7,300 册
统一书号, 3017·252 定价, 0.81 元

本书提要

近年来，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面目日益暴露。搞“缓和”政策，越来越行不通。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内主张绥靖和反对绥靖的争论也随之激化。“保卫美国”这本论文集，是美国当代问题研究所编的。论文集共收论文十三篇和一篇施莱辛格的前言，从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社会等方面论述了近几年来美国的外交和防务政策。其中心议题乃是探讨苏联执行扩张政策引起的问题并寻求对策。这本小册子，反映了反对绥靖的人的观点。现在翻译出版，供关心国际问题的读者参考。

目 录

- 序言.....门罗·布朗 (3)
前言.....詹姆斯·施莱辛格 (4)

第一部分 美国政策的政治和经济含意

- 第一章 绥靖与缓和.....西奥多·德雷珀 (9)
第二章 苏联对外投射其力量.....斯科特·汤普森 (35)
第三章 美国与西欧共产主义.....沃尔特·拉克尔 (56)
第四章 苏联通过中东威胁欧洲.....尤金·罗斯托 (71)
第五章 搞缓和的经济学与美国对外政策
.....格雷戈里·格罗斯曼 (92)
第六章 国家安全：关于无形因素的一些想法
.....查尔斯·伯顿·马歇尔 (113)

第二部分 美国的军事态势

- 第七章 核战略：缓和与美国的生存.....保罗·尼采 (133)
第八章 美国的战略力量：是飞快向前跑还是缓慢
向后退？.....艾伯特·沃尔斯泰特 (152)
第九章 欧洲的危局与美国的政策
.....爱德华·勒特瓦克 (229)
第十章 美苏海军力量的对比.....诺曼·波尔马 (252)

第三部分 人权与自由

第十一章 人权问题……………罗伯特·康奎斯特 (273)

第十二章 缓和対苏联生活境况的影响
……………伦纳德·夏皮罗 (289)

第四部分 结尾

第十三章 超出缓和范围的问题……………保罗·西伯里 (309)

序 言

1972年5月正式宣布缓和政策之后，人们都非常希望长期的敌对已成过去，苏美关系可能会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现实却没有使这种希望得以兑现；福特总统终于在1976年春放弃了“缓和”这个词。但是，他和亨利·基辛格国务卿一再质问，除了现行的政策，难道还有别的出路？他们并且把批评者谴责为危险的冷战勇士。

鉴于公众对当前的政策动向日见关心，当代问题研究所特请十三位国际关系和军事政策方面的专家，对当前美国外交和防务政策作一番评价，并提出改弦更张的方针。结果如何，请读者判断。

这是本研究所首次对国际问题的探讨，以前的研究仅限于国内问题。我们特别乐于将本书交给基础图书公司出版。我们认为，本书将会对当前这场关于美国外交政策应采取何种方针为妥的大辩论作出重要的贡献。

当代问题研究所所长 门罗·布朗
1976年11月于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

前 言

如果说美国在东南亚战争的后期阶段失去了自己内在的平衡的话，那末，这场战争的结束（以及其它一些事件），使我国开始走上了康复的道路。看来，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近年来那种激烈的冲突是越来越少了。我们对神志恢复正常和也许是由开国二百周年庆祝活动激起来的恢复民族精神的清晰迹象，都应当表示欢迎。

在这种新的精神状态下，我们正在再度着手认真研究我们的长远利益、美国在世界事务中必需发挥的或多或少是永久性的作用，以及在发挥这种作用方面受到的一些制约。正象越南战争这个可怕的梦魇已被摆脱一样，对缓和所抱的虚妄的希望（把缓和当作是一种符咒，以为一念这个符咒就会逐渐解决国际角逐中的重大问题）也正在消失。对缓和所抱的这种幻想，是一个由于已感到厌倦而谋求卸掉自己的职责的国家所产生的乌托邦的想象。这种幻想也反映了美国根深蒂固的一个看法，即认为国际秩序与国内事务一样，实现稳定是自然的事情。具体说，就是希望苏联人与我们一样地抱有实现稳定的愿望，愿意避免突然改变现状或在边际领域追求好处，从而准备通过“把问题连系起来”的办法解决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苏联人一直相当直截了当地表明，这种愿望不过是资产

阶级的一种梦想。要变成一个主张维持现状的国家，就意味着要抛弃残存的革命热情，这种热情今天仍然是苏联各种政策的动力源泉，同时也是使苏联的国家机器和党的机器结合起来的粘合剂。苏联的信徒们不断被提醒，阶级斗争的法则决不因缓和而被废弃，而是继续无可避免地在起作用，并随之而有种种作为。不过，幸运的是，这些法则似乎已不再要求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进行直接的军事冲突了。

尽管如此，苏联人一直着重表示，缓和几乎不包含西方观念中缓和紧张局势这个意思。相反，苏联认为，缓和要求加强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而加强意识形态斗争与缓和紧张局势看来是很难相容的。因此，紧张局势的缓和，就已经实现的部分而言，是单方面的，反映了西方放松了警惕性。对苏联人而言，缓和只不过是讨价还价和发生冲突这个持续不断的过程中的又一阶段而已。简言之，苏联人不是在谋求稳定，而是仍然热衷于从不稳定中捞取好处，即从西方攫取经济、政治或军事好处，不论是在边际领域还是其他领域。

为什么“把问题连系起来”这个概念已经完全从我们官方的用语中消失了，原因就在这里。它也部分地说明了为什么在非洲、中东、南亚，甚至西欧还持续不断地发生困难。苏联对民族解放战争继续给予支持（虽然是在精心选择的基础上进行的），因为据认为这些冲突所反映出的是些不受缓和约束的社会力量。它还说明，为什么裁军谈判，无论是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还是共同均衡裁减军事力量谈判，丝毫不能反映出是大家一起来寻求一个经过系统分析的稳定（搞军备控制的人谋求这种稳定是可以理解的），而是反映出了各自追求通过

磨掉对方的耐心来获取实力优势。可是，即使要从谈判中获得这样微小的成果，也要求以不断外流技术的方式付出经济上的代价。

其结果与我们曾一度企望达到的结果大不相同。随着实际经验使我们早先所抱的希望逐渐消失，官方对缓和这一概念的注释也在不断地修正，以使其含意跟上形势的发展。缓和和似乎已变成一套老是在变化的惯用语了。最后，缓和的范围缩小到只包含两个简单的目标，即必须避免核战争和“遏制苏联扩展到全球的力量”。至少后一目标使人们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错觉。

所有这一切渐渐地使公众对整个谈判进程的不安情绪增加了。确实，这是令人遗憾的，因为从事谈判不仅仍然是西方开明国家的一项道义义务，而且也是能够取得某些具体的彼此有利的结果的。但是决不能根据苏联人已经改变了心意，或是他们愿意接受我们西方对稳定的信念这种料想去进行谈判。一切谈判必须在深刻了解苏联的态度和策略的基础上进行。一般来说，苏联坚持采取这些态度和策略所引起的种种问题，就是这部杰出的论文集的中心议题。

并不要求读者同意每个作者提出的每一个具体论点。但是这部文集总的来说是一部透彻地阐明了许多令人信服的论点的著作。文集的论述反映了一个根本前提，即只有美国才有足够的力量在全世界维护自由和多样性，达到为使我们自己的社会制度欣欣向荣所必需的程度。因此，时刻警惕着苏联在各个领域——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军事领域和社会领域——里的战术目标和战略目标，仍然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任务。

首先，必须高举我们的文明所代表的独具特色的准则观念——这些准则观念的确使得我们的文明有保护的价值。罗伯特·康奎斯特援引了弥尔顿写的《最高判决》*中的一段话：“在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是给我了解情况的自由，发言的自由，按照良心畅所欲言地辩论的自由。”康奎斯特援引这段激动人心的话，令人信服地指出了孕育西方文明的根本信条。

正如 C. B. 马歇尔所阐明的，苏联人在不断力谋把“力量的对比”改变得于他们有利时，寻求在不进行战争或不受到战争惩罚的情况下达到他们的目标，这确实是令人感到宽慰的，尽管只是在有限的方面。但是，那只不过是我们要努力保持警惕，以使西方国家以及那些终归要以西方为楷模的国家，能够渡过这段困难时期的一个附加的动机而已。

没有疑问，认识到永久保持警惕是维护自由所要付出的代价，这仍然是毫不新奇、毫不足怪的事。由于美国已经恢复了政治上的健康，由于民族精神得到了恢复，我们重新认识到了这个无法逃避的现实，并正在准备采取必要的步骤来做到这一点。在这个重新觉醒的过程中，我们已抛弃了对缓和所抱的不切实际的期望。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苏联的“社会制度不同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概念，与我们早先所说的冷战态度没有明显的差别。苏联认识到核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点固然是使人真正感到宽慰的，可是苏联认为他们自己的社会制度必然要胜利这种信念着重说明，无论是力量的基本现实情况，还是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信念，外交只能使它们

* 《最高判决》(AREOPAGITICA)，这是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 1644 年写的一本小册子，内容为反对检查印刷品，赞扬思想自由。——译者

略微有所改变而已。这也就是说，我们的文明要继续存在下去，就需要我们坚持不懈地给予注意和作出努力。

詹姆斯·施莱辛格*

于华盛顿

* 詹姆斯·施莱辛格 (James R. Schlesinger)，从 1969 年至 1971 年，任白宫办公厅行政管理和预算局代理局长。1971 年至 1973 年，任原子能委员会主席。他曾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五个月，然后从 1973 年至 1975 年，任国防部长。从 1977 年至 1979 年，任能源部部长。——译者

第一部分 美国政策的 政治和经济含意

第一章 绥靖与缓和

西奥多·德雷珀*

绥靖在三十年代变成肮脏的字眼。在几个世纪中，它一向是一个完美无瑕、甚至体现美德的词。这个曾意味着和平与和解的词，怎么竟会转变成相反的意思呢？所以发生了这种变化，那是因为，这个词被用来描述三十年代对法西斯独裁政权的步步退让和与之进行的交易之故。转折点的出现，大约在1938年10月到1939年3月的某个时候。1938年10月，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在慕尼黑同意割掉捷克斯洛伐克领土的一个要害地区并拱手交给希特勒德国；回国后，他马上踌躇满志地大谈“我们的绥靖政策”，而慕尼黑协定将仅仅是执行

* 西奥多·德雷珀(Theodore Draper)，1968年至1973年为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的历史部研究员。他是对外关系协会的会员和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著有《美国共产主义和苏俄》和《滥用权力》等书。他经常为各全国性杂志撰写外交政策方面的稿件。

这种政策所迈出的第一步。他说，“真正的胜利”是“用谈判而不是用武力”完成“一项艰巨而微妙的工作”^①。

慕尼黑协定的确是第一步，但并不是张伯伦原来期望的第一步。1939年3月，仅仅过了半年，捷克斯洛伐克剩下的国土就改归德国统治了。斯洛伐克和喀尔巴阡—乌克兰名义上宣布了独立，实际上同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一道变成德国的保护国。原以为可用来建立张伯伦所说的“欧洲持久和平”的慕尼黑协定，结果却变成一张特许证，使希特勒得以在进攻西欧之前，先接管东欧。在以后的半年里，武力代替了谈判，提到绥靖这个词时，几乎不可能没有耻辱和憎恶的感觉了。

当然，这个词本身无可非议。但它为什么会被滥用呢？它为什么变成这样可憎的嘲弄了呢？显然，这是因为绥靖的做法并不能把不可绥靖者绥靖下来。如果法国和英国肢解和出卖捷克斯洛伐克是为了使自己买到和平，那自然是糟糕透顶的事；然而，断送了别人的自由，反而助长了希特勒吞噬领土的胃口，这种愚蠢行为便构成罪恶了。在那种情况之下，等于按照“分期付款”计划规定的条件投降。如果慕尼黑协定原来是什么就承认它是什么，这个协定的臭气本来不会那么令人恶心。这个协定令人实在难以忍受的原因是那种把它美化的做法，例如，伦敦《泰晤士报》上就有这样令人难忘的颂词：“从战场上凯旋的征服者，没有一个人的桂冠比张伯伦先生昨天从慕尼黑回来时头上戴的更为高贵。”^②

“缓和”是另一个本意非常美好但误用后名声狼藉的词。这个词大概是不太久以前从法文移植过来的。《牛津英文字典》第一次引用是1908年。这个词通常解释为“紧张局势的

松弛”，因此，词意可重可轻，这要看是什么样的紧张局势和松弛到什么程度。在1974年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关于缓和问题的多次听证会上，发言的人纷纷抱怨，认为这个词的含义必须加以确定。前大使乔治·凯南说，他“从来没有充分理解‘缓和’这个词〔在苏美关系上〕的用法”。对此，前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议论道，“就此而论，缓和是一个很难照搬原意的词，不过我认为这个词把我们难住了。”前参议员尤金·麦卡锡评论说，“每次使用这个词，它的意思都有所改变。”马歇尔·舒尔曼教授谈到“‘缓和’这个词的含义不明确”。赫伯特·迪纳斯坦教授则指出，“每个人对什么是缓和都有不同的概念”。前国务卿迪安·腊斯克说，缓和是一个“进程”，而不是一种“状态”。亨利·基辛格国务卿同意说，“它是一个持续的进程，而不是一种最后的状态。”^③从学术上给缓和下的一种定义把它说成是“国际关系的逻辑光谱，在这条光谱上，冲突有激化之时，也有减退之时”。^④

甚至对专家来说，“缓和”也还不仅仅是难下定义的问题；不管它是什么，看来它的含义是飘忽不定的和模棱两可的。从理论上说，缓和介于冷战与亲善或者甚至联盟之间的某一点上。“缓和”在两极之间动摇不定，因此它处于一种完全相对的地位，而没有自己的确切形象。根据这个概念，“缓和”总是在逐渐离开或者接近别的事物。^⑤因此，毫不奇怪，“缓和”一直很难明确其含义；就其性质来说，它被认为是过渡性的和容易变化的。

但是，从实践上说，当前的苏美缓和应当具有一种明确得多和容易辨认得多的性质。使缓和具体化，应该说是1972年

5月莫斯科苏美首脑会谈的主要成就；在这次会谈中，军事、商务和政治三个方面的协定，正式开创了苏美关系的新阶段。军事协定采取的形式是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定，它原则上规定了双方在反弹道导弹方面数量均等。商务协定建立了一个美苏委员会，用来促进贸易和经济资源的开发。政治协定体现为《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相互关系基本原则》。这三个协定的目的是使这种缓和在一定的程度上具体化和有个轮廓。“缓和”有了一整套明确的“基本原则”，不管这些原则可能是些什么，它就不能老是那么含糊不清和模棱两可了。

二

“缓和”的含义这么混乱，并不是因为它缺少定义和解释，而是因为它的定义和解释太多了。

美国最初的缓和理论，主要是亨利·基辛格1972年逐步发展起来的。这个理论背后的主要概念是军事、经济和政治之间形成“连环关系”。在这三方面，对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定所代表的军事连环关系，最初宣传得最起劲。在莫斯科形成连环关系以后，基辛格博士兴高彩烈。他把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定吹捧为一个“在与之有关涉的全部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协定”。他作报告说，最高级会议是这样成功，以致美国方面达到了所有它计划和希望达到的目标，“妥协互让占百分之十”^⑥，这真是外交会议的一个极不寻常的纪录。

再考虑一下,就不那么令人得意忘形了。越来越清楚,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定只不过是一张期票。1974年国务卿基辛格亲口说,如果不能“及早在1977年以前”紧接着再达成一项范围更广的核协定,“那末,我相信,人们将看到技术和数量的突破”达到可怕的程度。^⑦同年,核战略和军备控制方面最杰出、最有经验的专家之一乔治·基斯佳科夫斯基教授作证说:“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定并不禁止或限制战略武器竞赛。那些协定只不过是促使每方采取它认为军事上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向进行这种竞赛。”^⑧没有迹象表明进一步的协定能在国务卿基辛格提出的1977年期限前签订。

在美国方面,它一贯认为,苏联之所以对缓和感兴趣,主要是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⑨。驱使苏联这样做的基本因素来自生产增长率的不断下降。根据苏联的官方材料,1950—1958年的生产增长率是10.9%,1958—1967年下降到7.2%,1967—1973年则下降到6.4%。西方重新计算的苏联数字是,1950—1958年为6.4%,1958—1967年为5.3%,1967—1973年则为3.7%。^⑩苏联出现这个问题的关键原因是,它跟不上西方的先进技术。最初,勃列日涅夫政权曾经设法通过早期的同法国和德国搞缓和来克服这个弱点。但是,到了1972年,美苏之间的缓和使美国成为转让科学技术的更好的来源。

然而,有一个障碍。苏联对它所要的东西没有支付能力。它要求美国政府给予大宗的长期信贷,利率却要格外低。它要取得最惠国地位,但它又不能采取互惠行动。它要提取整套的工厂设备,交付的条件却意味着,苏联将拥有一切,而西方交货一方将承担全部风险。这样一种经济关系,自然是不